

台灣木工藝產業的生根與發展過程解讀 (2) —日治前期 (1895-1912 年) 的「產業」醞釀與成長

諸葛正

朝陽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
e-mail: cchuko@cyut.edu.tw

(收件日期: 95年09月13日; 接受日期: 95年12月02日)

摘要

本篇論文為日治時期台灣木工藝產業史研究系列的第一件，主要研究目的在於建構台灣日治前期木工藝產業史的整體詮釋結構，並逐步解析其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重要特徵內涵。研究範圍主要集中於日人剛統治台灣的前段時期（從 1895 年至 1912 年的期間）。主要的研究成果彙整出四點：1. 瞭解台灣從清治時期進入日治前期之後，貨輸入材料與器物上的依賴逐漸從中國轉到日本。2. 受到異國統治影響，台灣既有的產品形制與製造技術開始出現日化、西化的形式轉變。3. 清治時期的個人式經營方式逐漸有朝工廠化、產業化方向變化的跡象出現。4. 西方近代教育制度與思想的引入，也開始影響既有的傳承模式。

關鍵詞：木工藝產業、工藝史、設計史、台灣

一、前言

本系列研究論文的發展源起於筆者透過研究地方木工藝史之際，所同時蒐集台灣木工藝產業史相關資料整理解析後所得出的成果。一開始只是思考作為地方木工藝產業史的背景輔助說明有其必要性（擔心以台灣為主體的範圍是否極易演變成大而無當的結果），但後來卻發現反向從整體台灣面向思考的台灣木工藝史解讀，不但仍有其必要性（因為現階段的既有文獻、書刊仍多是處於強調特定部分面向為中心的內容敘述），並且這類形態的敘述內容在知識與教育傳承上，比起特定地點研究結果的呈現，更有其入門的親近性及興趣引發的效果，遂促使本項研究議題因此而產生。

本系列論文第一部份（設計學報第十卷第四期）之論述中心集中於台灣木工藝產業史研究的最前期（清代以前與清代），主要以清代志書文獻中所見有關台灣木工藝產業相關發展紀錄，瞭解台灣木工藝產業古漢人移民增加與定居情形漸趨熱絡的進展下所呈現出的變化軌跡與特徵。

清代是台灣開始有大量文字記錄出現的時代（並且是中心記載的文獻），也是台灣全島逐步文明開拓的重要時期，作為與一般大眾生活最為親近的民生用品生產與使用的製造產業（如本文敘述中心的木工藝產業等），自是首舉拓初期就展開其落地生根的演化過程。

不過一個產業的發源與成長，自然不是一蹴可及、旦夕之間就能輕易完成的流程，而是必須長年累月的漸進發展。至清代時期結束為止，台灣木工藝產業只能說是隨著漢人大量移民來台，且非常自然地

也隨著民心必然的需求中，逐漸在臺灣本地落地生根與茁壯。從前述一頁即可得知許多清代遺留文獻中，所能展示出的極其片斷卻又似乎初顯徵兆的台灣原初木口壘產業之發展實景，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清代後期木口匠的落地生根實證（也是台灣木口壘產業本地化與成長的源頭），以及清代時期所能得知的相關木口壘產業製品與產業用語之使用方法與使用可能場景的想像理解。

本論的時間點如副標題所述，是從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與日本後開始，此時期的台灣木口壘產業逐漸脫離原鄉中國的母體，並開始受到新統治者日本所帶來的社會、產業、文化等各面向觀念影響而出現新的轉變。台灣日治時期會歷經三個不同的古位天皇，當然不同的古位天皇並不意謂代表跟本論所要探討的日治時期台灣木口壘產業發展史有向直接影響關係，只不過古經由資料彙整判斷後，發現這三位古位天皇所古時期之區間分別，剛好也可用來定義與區分日治時期台灣木口壘產業的重要發展特徵之不同影響階段，並可同時進行與前期的各自比較，遂形成本論與將來的後續作，皆仍以當時的日本天皇古位區間作為論述的分節點，而當然其各自的差異特徵也會在結論敘述時一併強調說明。其實台灣歷史研究者通常會以軍人與文人總督治台前後的不同政治治理風格上之區別，來分割論述歷史分期的意義（當然也還有其他的區分方法），這當然也無不可；不過相對而論，本來歷史論述上的具體分期點設定，原本就不易達成（歷史時間本身自是不會自動分期），故此，何謂「最」有意義的分斷點其實很難清楚判定，只能說為論述上的方便權宜之計，找尋出比較可以進行判斷前後期是有些許可比較不同處之時，在那之間下一個標準切割點。所以本研究運用日天皇古位時期作為切割點，除前述的判斷外，另外也參考日本設計史學界所經常引述之日本設計史的分期點，像是大量外銷輸出與西化的明治維新時期；設計意識高漲、美術逐漸發展成圖彖與木口壘分野的大正時期；工業化與機械化技術發展、日本商工省木口壘指導所設立、產業木口壘急速發展的昭和時期等[6]。第三作預定的昭和時期（1926年）論述便是以上述論述為判斷比較的基準點（木口壘產業機械化與教育講習積極展開的時期），至於第二作的大正時期（1912年開始），除前述之因外，這時期同時也是台灣木口壘產業材料使用上變化的關鍵時間點（像是木口壘林場開發與檜木的開採使用等），故以其作為分期點標準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同時為求更深入理解日治時期文獻記載的論述思考模式，古本論中的年代標記上，會大量運用西元—日天皇紀元的書寫記載模式，畢竟這些遺留下的日治時期歷史文獻多半由日人著成，作者也多半是由日人或受日本影響既深的台人所撰寫，故在解讀這些有關現象時，無可避免的會出現許多以日本本位式思考為中心的論述表達方式，這跟長期以來台灣日治時期木口壘產業史（甚至大多數其他日治時期木口壘產業史的相關研究）以中國本位式思考為中心的表達方式會有相當不同程度的立場差異展現，除上述古內文說明的敘述外，古特徵解析與結論的敘述方法上也會有所影響，這是古進入本論之前必須明示之事。

古敘述研究動機緣起，與釐清論述分段原因以及前後文銜接的原則後，以下針對本研究的要名詞使用定義、研究對象範圍、以及論述敘述架構（含研究方法）、資料來源，研究目的等項目逐一進行說明。

本論文中所述木口壘產業泛指各類以木材為原料所形成的製品製作之產業類別，舉例而言，如家具、佛像、木製器具等相關行業。不過古進入日治時期後這些類別名詞的使用與分類統計已開始有獨立各自發展的傾向出現，這也會古本論中隨論述需要進行逐一解釋。而古清治時期論述家具相關項目時經常必須論及竹製家具的相互比較內容，本論中當然也會多少提及，不過此時期的木口壘產業發展已較為區隔明顯，故古力會比較集中在古木口壘產業本體上。此外，除與製品直接有關的敘述外，相關產業發展上的匠師傳承、技術、材料使用等內容也是研究此時期木口壘產業史時必然論及且不可忽略的部份，也會一併論之。

研究方法主要使用歷史研究法，希望透過對歷史的積極回溯，思考前人生活器物文化產生的原因與延伸發展的軌跡與特徵，以能進行傳統生活器物文化史發展的初步奠基。研究重點主要依據史料與文獻中所呈現與台灣木口壘產業資料之各面向有關的發展實貌解讀為主要核心。日治時期所出現的文獻數量種類相當繁多，運用地方志書（如各州廳志）、各類叢書（如民俗舊慣調查、台灣木材產品、展覽會資

料等，使用部分會列示於參考文獻處）、統計報告（如台灣總督府統計書、各州廳統計書、各類商工統計書等）、廠商資訊（如工廠名簿、廠商簡介等）、報紙（如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報等）、雜誌（如帝國工藝等）等文獻資料，試圖直接以產業形成發展為主，以文化、社會、貿易經濟、教育、旅遊、展覽會、民俗習慣等面向為輔的交織論述方法中，解構另一種台灣木工藝產業所呈現面貌的詮釋目的。

本篇論文作為日治時期台灣木工藝產業史研究系列的第一件，其整體結構不同於前作清治時期的跨越較長時間之論述模式，而相對地主要集中於日人剛統治台灣的前段時期（從1895年至1912年的期間）以進行解讀。其實這段期間剛受日人統治，許多生活習慣與社會文化環境皆得重新調適，而現今我等所習慣認知的台灣木工藝產業面貌之部份特徵，也是於此時期開始受到日本影響而發展奠基，並逐漸融入既有日治的木工藝產業文化脈絡中。期望藉由上述研究過程建構台灣日治時期木工藝產業史（同時作為與台灣設計史研究領域銜接的起步）的不同詮釋結構，並逐步解析其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重要特徵內涵。

二、日治前期台灣木工藝「產業」的醞釀與成長

本文日治前期的期間定義設定於日明治時期（西元1895年—明治28年至1912年—明治45年、大正元年、中華民國元年）。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清廷戰敗，於馬關條約中議定割讓台灣與日本，日人遂快速進駐台灣，一開始雖然遭遇從北至南的地方軍隊與居民的抵抗，但仍很快地鎮壓平復，並逐漸順利建立平穩的統治環境。

2-1 回顧清治時期（尤其是後期）台灣木工藝產業的既存樣貌

政治上的紛爭或許不是那麼容易就能立刻穩定的事，但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不會因為統治者更換就馬上出現突然性的轉變，而必然呈現的是漸進式的影響變化，台灣的木工藝產業也因此開始進入轉換調適期。從前篇清治時期的論述中可以彙整得出，歷經兩百多年的清代統治，台灣逐漸開放而不再封閉，漢人於清治後期便開始大量移民進入台灣。而同時台灣木工藝產業的雛型，古人在木工藝產業匠師陸續來台定居扎根與發展之後，也開始嶄露頭角。不過經常於文中標題所用的木工藝「產業」一詞，尤其像是產業形容的稱謂方式，其實在明治時期的台灣文獻記載中，仍不多見，甚至可說幾近於無。這時期的狀態比較像是從清代統治末期的個人經營模式演化成小型店舖型態的轉化成長期，所以接續的章節內容會逐一討論這些轉化過程中，一些相關面向古木工藝產業的產業環境成熟前之交互影響實況。

以下各節會從貿易輸入、現地材料使用與產品製造間的各種象徵與對應關係、日人的調查報告與報紙中所透露出產業與產品的發展訊息、對外展覽會中所呈現出的台灣木工藝產品特徵、手工製作技術與機械化進程的發展以及傳承教育面上的影響等順序，展開各面向的各自與交互性論述，以求全面性展現此時期的台灣木工藝產業之真實面貌，以及剖析其各項因果關係間的影響脈絡與特徵。

2-2 貿易輸入

日治前期的民生與社會發展有許多仍是沿習清治後期而來，未曾有太大習慣上的變換，所以本節論敘的一開始，也沿用前論的慣用模式，從貿易輸入與地方性的材料使用方面著手，先從舊有的文獻記載論述模式中瞭解日治前期木工藝產業的發展面貌。

清治時期的台灣因為採伐技術問題與本地材料開發時間尚短，以及使用上仍依賴原鄉習慣等原因，導致本地材料的採伐使用仍未臻發達之境，雖然前一時期也已提及，大陸來台的木工藝匠師開始

古本地落地生根，以及進行相關產品的生產製作，但這頂多只能說是計畫逐漸減少依賴原本的輸入管道，而並非表示立刻就完全斷絕輸入。所以統治者雖然變換，但對外貿易的輸入數量仍是佔有一定比例。以下便從當時唯一擁有較為完整統計紀錄的「台灣總督府統計書[27]」中一窺其貌(表1、表2)。

表1為日治前期由當時日本以外的外國輸出入台灣的木材、家具、木製品的相關記載，表2則顯示相關記載項目與日本本土的貿易往來紀錄。由表1與表2右半邊的輸出紀錄首先可知，相對於輸入的數量而言，日治前期的輸出量極少，表示台灣當時雖然已開始產生自製能力，但仍稱不上有能力可以大量輸出；而由木材輸出的數值可知，台灣本地的木材採伐技術與林地開發政策仍尚未成熟。相對於此，右半邊輸入的紀錄部份，則顯示出台灣當時仍相當依賴外地進口的材料、產品，以因應產業與生活中的必需使用量，而且在此時期主要依賴作為統治母國的日本本土輸入；輸入木材種類乃是如同清代時期一般，以建築用的杉木(福州杉、日本柳杉等)為中心；而輸入生活器物種類則以桶、盆、鍋蓋等為主。由上述貿易資料來看，家具、木製生活用具等項目依賴外地(甚或日本)的產品輸入數值似有漸形成長之勢。而從日治前期仍以農業為主要的產業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當時本地產業統計仍未具體施行，加上本時期工廠名簿中的相關工廠數量記載也甚少等情形影響下，也只能由這些唯一留存下來的貿易輸入數字中稍微一窺日治前期台灣本地的家具、木製品需求的逐漸成長趨勢。而由日人統治之初所著「臺灣紀要[8]」中的相關敘述：「…輸入品中的重要項目有織品、海產、木材、藥、金器、木製器具、酒類、日用品等…」與「臺灣實況[35]」中所敘述的「…從支那大陸的輸入貿易大部分是奢侈品，如日用家具、吳服、飲食品、日用小器物等雜貨…」等文中得知輸入重要項目中皆有木製器具、日用家具等類別存在；以及「臺灣日日新報[20]」的新聞記事中也記載著1901年(明治34年)5月時由日本輸入基隆港的家具數值有3513元，且其數值大小排序只居於金屬、水泥、木材、酒、菸草、布、紙、米等數值之後，其他二十項民生用品之前等情形中，也可顯示出家具、木製品等項目所佔當時輸入品中的重要需求比例。

表1 日治前期(日明治時期)的木材、家具、木製品的輸出入數值

單位：圓

	輸出國外木材及板類數值	輸出國外家具數值	輸出國外木製品數值	國外輸入木材及板類數值	國外輸入家具數值	國外輸入木製品數值
1896年(明治29)	614	無紀錄	無紀錄	219,407	5,588	5,293
1897年(明治30)	9,704	無紀錄	無紀錄	506,902	11,967	22,841
1898年(明治31)	9,817	無紀錄	無紀錄	806,283	26,434	28,740
1899年(明治32)	11,264	無紀錄	無紀錄	609,532	19,329	13,581
1900年(明治33)	29,628	無紀錄	無紀錄	622,645	18,332	12,511
1901年(明治34)	25,144	無紀錄	無紀錄	517,886	20,062	16,788
1902年(明治35)	12,282	無紀錄	無紀錄	531,220	13,694	10,711
1903年(明治36)	14,191	無紀錄	無紀錄	521,599	12,370	13,072
1904年(明治37)	23,089(只剩板)	無紀錄	無紀錄	632,462	無紀錄	17,566
1905年(明治38)	17,134	無紀錄	無紀錄	548,112	無紀錄	17,382
1906年(明治39)	20,943	無紀錄	無紀錄	596,578	無紀錄	26,264
1907年(明治40)	15,490 (梢楠、其他)	1,494	2,436	430,725 (杉、其他)	無紀錄	29,635 (桶、盆、鍋蓋)
1908年(明治41)	13,707	808	1,952	612,055	無紀錄	39,517
1909年(明治42)	18,004	1,016	2,643	528,545	無紀錄	46,994
1910年(明治43)	16,913	456	3,113	658,702	無紀錄	41,748
1911年(明治44)	16,818	無紀錄	3,218	578,549	無紀錄	43,974

而清治時期曾提及運送這些木材、器物來台的郊行商，則因為受到清治後期開始的港灣逐漸淤塞，以及甲午戰爭後部分富商回歸大陸風潮的影響，逐漸喪失其影響力。雖然運送大陸福州杉來台自古日治前、中期仍主要依靠這些郊行商人，但從表1、表2中也可比較出，台灣其實自進入日治時期後，已經開始更為依靠從日本本土輸入的木材進口供應，而這也促成日後古台灣的日本與本土木材商人行業的興起。

舉例而言，本時期的日本輸入木材幾皆依靠日本木材商的台灣分社，或跟日本木材商社有上下游支援關係的地方木材商社控制，1908年出版的「島內消費木材調查[16]」一書中便已記載著基隆10、台北11、台南7、高雄1、媽宮1等本地木材商社，而其負責人幾乎全是日人。

表 2 日治前期（日明治時期）的木材、家具、木製品的日本內地輸出入數值 單位：圓

	輸日木材及板 數值	輸日家具 數值	輸日木製品 數值	從日輸入木材 及板數值	從日輸入家具 數值	從日輸入木製 品數值
1900年(明治33)	1,448	無紀錄	無紀錄	1,220,449	1,765	無紀錄
1901年(明治34)	800	無紀錄	無紀錄	785,968	39,543	無紀錄
1902年(明治35)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737,150	10,369	無紀錄
1903年(明治36)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1,002,580	23,579	無紀錄
1904年(明治37)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930,705	23,113	無紀錄
1905年(明治38)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1,189,400	23,692	12,482
1906年(明治39)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1,356,704	30,856	14,763
1907年(明治40)	23,099	無紀錄	無紀錄	2,138,617	36,778	16,591
1908年(明治41)	14,215	無紀錄	5	2,168,859 (杉、松、檜 等，以杉為主)	32,714	35,860
1909年(明治42)	35,320	無紀錄	無紀錄	2,207,528	19,134	33,322
1910年(明治43)	79,430	無紀錄	無紀錄	2,859,844	29,549	112,284
1911年(明治44)	105,906	13,891	1,827	2,577,315	60,983	179,226

2-3 現地材料使用與產品製造間的各種象徵與對應關係

貿易數值提供材料、產品輸入的需求成長想像，但數字也只能說明需求與趨勢的變化，古產業敘述仍缺乏具體大規模出現前的本時期，有關台灣木材產業的發展實貌也只能從一些相關的論述中交叉進行觀察，以下先從清治時期使用慣用的材料與產品製造之相對應貢獻中著手。

從日人剛統治台灣初期所出版的志書文獻中可發現前朝記載方式的延續，如1897年（明治30年）「苑裏志[32]」與1898年（明治31年）「樹林志[12]」中雖皆提及不下二十餘種的樹種名稱，但此時仍尚未提及檜木，可知檜木在此時仍未被正式發掘使用（當然台灣檜木皆生長於海拔至少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處，古當時機械採伐仍未興盛之際，自然開發腳步便難能至高海拔地區，故此時期本地樹種使用仍是以低海拔處便可採伐的闊葉樹材為主）。而在台灣，與檜木產品化有關的記載或許要如至1899年（明治32年）前後所出現的「臺灣日日新報[18]」中之販賣廣告（圖1）所示，或才可宣告正式展開。至於台灣木材檜材販售與重要相關訊息的出現則要至1907年（明治40年）後（註1）才始見頻繁，如1907年2月20日「臺灣日日新報」的巒大山檜材製材販賣、4月6日的報導則指出「巒大山檜材市場所出產檜材，壓低日本內地檜材的販售銷路，且家具用材與建築用材等多用本島檜材…[22]」。皆顯示出日人因慣用檜材，並將其使用習慣帶入台灣後，也逐漸影響改變台灣本地的既有用材習慣，而日人開始採伐開發台灣檜木的舉動，也造成後來台灣著名的幾個林場開始進入開發時期，以及逐漸醞釀形成古人開始使用檜木造廚製器的習慣。不過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則要待日治中期（大正時期）林場正式開發後始見較為蓬勃發展，故暫將其留待後文再述。



圖 1 檜木販賣廣告

此外，日人自統治台灣之初觀察描述當時本地台人的主要居住習慣時，也提出許多可供描繪當時狀況的參考論述，如「嘉義管內採訪冊[26]」所述：「地有杉木，廳堂、房屋、楹柱、門窗，多以此為之。…其中擇其大者可為樑、為柱。小者亦可為楹、為角。…居處貧富不同。富者廣廈雕樑棟，以杉為楹、為桷。貧者居室竹楹、茅舍。總之，茅舍多於廣廈也。茅舍以茅草蓋屋，竹楹以蔴竹為楹，村社許多。」；與「臺風雜記[9]」中所示：「臺人之家屋，不多用木材，…臺人以竹製器，自寢臺、椅子類至柱楹、船車之屬，皆不以木材而用竹。…臺人室內敷甃石，不設我所謂床板者。正面置案榻，其側安寢臺。寢臺長六尺許、幅四尺許，以樟、杉等作之。欄楹雕刻花紋鳥魚等，垂翠帷，形似我佛壇而廣濶。…」；以及「臺灣日日新報[19]」中也提及：「富裕之輩所坐菱椅大抵以木為之，非富有之家則不敢用木而用竹，以木椅貴而竹椅賤也…」，皆顯示出此時台人除富有人家能居住木造住宅、使用木製器具外，一般居民則大多數只能住竹屋、用竹製器具的普遍生活樣貌。而除文字描述外，這些上流階層的豪華木製家具使用與一般平民的生活實景，同時也可從「地理風俗臺灣事情[2]」中日人所觀察繪製的插圖上來加以實證（見圖2、圖3）。



圖2 富有人家的木口塾家具



圖3 理髮店的家具使用

除圖繪可以看出實際的狀況外，從「臺灣舊慣調查報告[33]」也可再次證明富有人家與一般平民在購買與使用家具上的差異習慣。舉例而言，像上等社會家庭的生活費中，單用於家具費（有金屬、木、竹、陶、瓷器）上的支出花費一例是佔5.7%，一例則佔19.8%；往中層看，中等社會商農家家庭的生活費中，支出家具費使用所佔比例一例為14%，一例為21.5%，較小康的商農家也至少有4%至7%的比例存在；下層農工家庭收入雖然不多，家具器具的購買費用雖然比例相對偏高（15%-20%），但也必然有此項存在。而這其中最顯著的差異誠如前述，上等社會家庭的家具費支出細目中，幾乎都是杉木（福州杉、日本柳杉）、肖楠木等所製的木製桌、椅、床、櫥；而一般農工、農民的生活家具費細目中，則幾乎是竹床、竹椅等基本且廉價的配備，家具使用材質的不同，很容易地自然也成為身分地位的不同表彰。

日人最初觀察台灣現地使用器具之實景，也可從現地的材料使用與產品器物製造之間的相互對應關係中探究究竟。為便於對照比較，特以「臺灣誌[15]」與「臺灣踏查實記[4]」兩本書中所述有關內容進行彙整製表，其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進入日治時期後，原本清治時期既有的製器材料，如茄苳、石柳、楠、烏心石、肖楠、檫、樟等固然存在的建築、器用用途樹種，自此時期文獻的記述上，已經開始大幅出現家具用途的記載。另外，台灣木口檜材的厚殼（扁拍）之使用用途（建築、器用、棺）也隨著日人的積極開發，而在1899年（明治32年）的出版書籍文獻上開始嶄露頭角，日本特徵也可跟前述台灣日日新報所記載的檜材開始販售之廣告出現時間點相互印證與支持。不過雖說用途看似琳琅滿目，但仍要提醒的是本時期的木口木材開採其實仍屬少量，林場計畫開發也還未開始，木材使用仍是得大量依靠從外國、中國、與日本的進口木材供應，才能應付台灣本島居民的平時生活所需。

表 3 日人統治台灣之初對台灣本地出產木材的產地與用途之調查紀錄

樹種名稱	主要產地	輸出地	用途
加多柴、茄苳	南部中央	廣東、福州	家具、餐桌、箱
石柳柴		寧波	印材、匾額
楠	島中央	廣東、福州	船材、家具、寢臺、椅子、門窗、櫃、箱
山杉、烏心石	中央	中國各地	家具、寢臺、椅子
蘭心柴、爛心木	北部		器械、齒輪
欖榔木、梢楠、黃肉樹	中部以北東勢角、三角湧		家具
油杉	北部坪林尾		建築、器用
厚殼、扁柏	宜蘭		建築、器用、棺(台人)
雞油、櫻	東勢角		建築、器用、造船、車輪車軸
樟	中部以北、南部、台東		建築、器用、造船
梧桐	玉山、大嵙崁		箱、火鉢、家具

本地產木材的使用用途如上述，相對地本時期的輸入材使用用途又是如何？最後便以此比較內宮件為本段落的綜結。資料來源主要引用日治前期後半段的 1908 年（明治 41 年）所出版「島內消費木材調查報告[16]」。相對於本地產材多用於建築、器用、家具等項目，從日本輸入的木材則多屬於製造橋樑、房屋棟樑、室內家具等建築材料，以及製箱箱材等用途之柳杉（Japanese Cedar，佔最大宗比例）、松木、檜木等木材為計；而從中國輸入的木材幾全是杉木（福州杉、漳州杉），主要多用於製棺（約 20%）與茶箱用板（約 40%-60%）等。可知輸入木材多半是屬於杉木，且多用於建築、製箱、製棺等用途上，跟本地產材還會用於製造一般器物的用途確有使用上的差異之處。

2-4 日人的調查報告與報紙中所透露出產業與產品的發展訊息

雖說本時期的完整產業統計調查仍付之闕如，但仍可以從文獻中找尋出個別零星的產業相關訊息，而再將其重新組織與統合解析後，也應能適度地現出日治前期的個人—工廠—產業整體環境發展上的初步樣貌。

首先從個人，也就是匠師部分談起。日人自統治之初，為求盡快瞭解當時台灣所有的人事物以求能有效掌握，遂於統治後幾年內進行幾項大規模的完整調查工作，像是 1896 年（明治 29 年）的戶口調查、1898 年（明治 31 年）的土地調查、以及 1900 年（明治 32 年）的台灣風俗習慣調查等。而本節一開始便是利用最後這項台灣風俗習慣調查完後所產生的調查成果報告書[31]，從有關內容中進行至 19 世紀結束時，台灣既有木工塾匠師的工作職掌與名稱差異上的瞭解。

清治時期最後幾年所刊行的「安平縣雜記」中，其實已經記載有關木工匠名稱及工作項目等，後來於 1902 年（明治 32 年）所刊行的「南部臺灣誌[14]」也沿用其寫法，使用如「小木匠」、「鋸匠」、「鑿花匠」、「桶匠」、「木屐司阜」、「棺木司阜」、「刻印司阜」等稱謂。而甫進入日治時期後的這項調查報告內容中，則又在其基礎上分類更加細分化。像其談及木匠項目時，就分為「粗木匠」、「嫩木匠」、「細木匠」三種，「粗木匠」是指專作鋸板、造門、鋪地板者；「嫩木匠」則指佛閣廟殿的棟樑雕刻、人物花鳥雕刻等工作者；最後的「細木匠」則專指製造各種椅子桌几、器具的家具師。現在這些稱謂在現實中的使用情形，其實並無嚴謹規範，一般也是視需要各自選擇取用，而若仔細比較之下，也不難看出這些稱謂定義的不同，其實也只是分類習慣上的差異所導致，太過計較哪個定義是較為正確或正式的使用方法，似乎也無其必要性。

至於實質上建立相關工廠而有名號者，在日治前期的產業工廠名簿訊息中幾乎未見，大概只有「臺灣總督府第三統計書[27]」中曾一度記載 1898 年（明治 31 年）台北新起街日人所設立的「三共舍」家具工廠（有 6 位日人工匠，2 位台人工匠）。此外只能從日治中期開始陸續刊行的「臺灣工場通覽（註

二) [29]」一書中，對於相關木工藝產業工廠創立年代的紀錄上，才能推論得出台灣木工藝產業草創階段的形成概況。而從這份名簿中大概可以整理出以下 3 點結果：1. 名簿中所呈現出成立於日治前期（明治時期）或更早的紀錄其實不多，可見至日治前期為止（1912 年以前），台灣的木工藝產業仍正在慢慢崛起與成長中。2. 查閱連續日後數月份的「工場通覽」名簿後，比較可以確定的是官方文獻記載中，在臺灣成立於日治時期以前的木工藝產業工廠記錄只有兩個，是為台北松山「黃金水指物工場（家具工廠）」，於 1884 年（明治 17 年、光緒 10 年）設立；以及台中清水的「楊義美指物工場」，於 1893 年（明治 26 年、光緒 19 年）設立。這當然不是說其他地區就沒有工廠出現，像清治時期之敘述中，其實也可從家譜、地方耆賢文獻記載裏找出過更早紀錄，但畢竟這些工廠是否繼續存活至日治時期，以及這些工廠在當時必然較為出名，故相對地如創立年代等相關資料也極易就能出現在文獻記載中，這些可能性的原因自然也就造成現今文獻中所呈現出的這類印象。3. 台灣幾個重要區域的工廠記錄，從日治前期的創立年代中整理加總的結果，顯示出日治前期設立於台北的木工藝產業相關工廠數約有 15 間、最早設立者就如第 2 點所述；再來是中部區域，於日治前期設立約 5、6 間，且除第 2 點所述的清水外（清水當地在當時其實還有另外兩間工廠存在），其他地區中的最早設立者還有 1895 年（明治 28 年）彰化的「林巧案指物工場」，以及 1911 年（明治 43 年）鹿港的「益和指物工場」等；至於南部區域當時記載約有 9 間，最早出現地區則是嘉義，於 1896 年（明治 29 年）設立的「泉源吉指物工場」。其他此處未寫入地區，則表示至日治前期為止尚未有記錄出現。且這些記錄皆集中於家具工廠上，有關木工藝產業的其他項目，雖然也有些項目的最早紀錄也是出現於此日治前期，但為集中論述之便，這些此時期尚零碎的敘述皆移至日治中期後文中再行整合解讀。

瞭解個別工廠的發展後，最後來到整體產業項目。論述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日人統治之初，從其各類闡述台灣民間風情的文獻，與「臺灣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記載中（註 3），描述還原當時木工藝產業的階段形成景象，以及判讀其對當時台灣的產業（工業）原始印象；第二部份則以「臺灣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記載中，報導相關木工藝產品的風格形制外觀與出現的時間紀錄點，以便次節能夠繼續銜接木工藝產品參加海內外展覽會的相關議題。

原始印象也分為兩部分來看，首先是台灣自清治時期以來便已落地生根的雕刻、神像雕刻評價。日人並不崇拜神像，神像對他們而言是一項嶄新觀感的器物，所以對台灣本島當時日治的神像雕刻十分推崇，如「臺灣島[11]」一書中便提及：「…此外佛像或是置物（陳設品、裝飾品）的雕刻等皆相當製作精巧…」。且日人自統治初期，在尚未掌握人心之前，也不敢任意摧毀台灣本地既有的基本信仰價值觀，所以在 1896 年（明治 29 年），便以台灣總督之名義頒發諭告曰：「本島在來之廟宇宮寺院等，在其創建雖有公私之區別，總之是信仰尊崇之結果，又是德義之標準，秩序之淵源，治民保民上不可或缺者也。故目前軍務控德之際，出其不得已雖有一時暫為軍用，切勿損傷舊觀，需要特別注意。就中如破毀神像，散亂神器等作為，苟且斷不許之。自今以後須小心注意保存，如果暫供軍用者，須火速回復舊態，此旨特為諭告[3]」，表示出日人對台灣既有雕刻器物的尊崇心態有部份也來自於政治上的呼籲與告誡。至於另外一個印象觀感則指向工業項目（並且內含部份跟木工藝有關的評價）。如「臺灣事情[13]」中所提：「工業的大部分是手工生產，是尚未使用器械未進步的程度，其職種有鐵工、木建築工、家具師、雕佛匠、金銀細工師、寶石匠、…其生活水準相當低劣」；「臺灣紀要[8]」中也引：「木工除了會製造堅固巧妙的喪葬用棺桶外，其它便沒什麼，造船時也多用木工，而且其製造方法迂腐，只止於製造竹船，其他的器具、建具皆只能仰賴中國、內地（日本）。…內地人在臺從事製造業也尚未發達，至今日連一間公司組織也沒有，…只有使用木工、土水小器械進行製造的建築工匠存在…」；以及「南部臺灣誌[14]」中也提及：「…綜觀之，其地精巧的器具皆是得仰賴中國、內地，在本島只能製造出應付眼前日常所須的雜器具，所以在工業上值得特筆大書者甚少…」；最後，「臺風雜記[9]」中則敘述：「工匠之精巧者甚鮮，是以富豪築屋造器，大抵聘良工於對岸，以臺匠為之助手。初我總督府僱工築屋造物，遲緩不應急設；…」。前述論評皆出於 19 世紀末前後幾年（1896、1897、1902），也表示出在日人統治之初，

似乎並不太尊崇台灣既有古老的木工藝產品製造技術，不管是製造器物所表現出的外觀內古，還是製造技術的機械化程度，或說製造器物的技術水平等，皆很難受到日人好評。當然古無證據可供比較考證的情況之下，這也可能只是顯示出殖民者的標準心態與說詞。不過從最後一例(1903年刊行)持平視之，其似乎較能明確的描述出當時產業技術的發展水平。或許更好的技術與工匠，古當時還是只能求助於對岸的中國大陸，台灣本地工匠的水準仍尚未能達富豪的產品要求水平，或說本地的技術人才仍尚未能夠承擔高級產品製造上的需求。

至於「臺灣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記載中，則有少許的產業統計可供參考。以下摘錄重要產業相關報導記載如表4。

表4 日治前期「臺灣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中的木工藝產業相關報導彙整

日期與版別	內容紀要
1.1896年(明治29年)9月1日3版	台北大稻埕日人開設工廠與日人工匠紀錄中顯示，木製業計9間、174位工匠；雕刻業1間、5位工匠；製具商1間、工匠3人。
2.1896年(明治29年)9月21日3版	官私營器物新築減少影響木製業混亂，一百人中就有四十人失業工作，有許多轉作家具師以謀生計。
3.1908年(明治41年)3月28日4版	各官衙之製業。其工藝此年度亦能竣工。…目前為同盟罷工之稽遲。故峻成之日期延緩。現已辦組合。欲再雇入內地木匠百人。…而臺北木匠職工之現數。合計四百五十三人。更揭載如。棟梁匠工二十名、木匠組合員二百六十五名、(現尚半數罷工)組合以外木匠二十六名、製造匠十名、官衙雇定之木匠九十名。
4.1909年(明治42年)3月28日8版	茲我各處細木商眾等，竊思邇來世態變遷人心不古，凡習藝之人，皆不遵規約，恐日久愈亂，則將來難以教授矣。爰邀集諸同人會議，將舊約作廢，重立新規為憑，所議條件計有十條。均載明公約簿內。已於舊二月十日成約連印。然各處細木商有不及通知，或新設商號不得於此時立約者，其欲教授門徒，務宜照議約所行，向爐報明加入公約簿內蓋印，便知其詳。自今以後各號如有雇用習藝人，期限未滿者應隨時辭出，不得擅雇，倘故意仍雇店中，一經查出，照規約公罰，特此廣告。明治四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各處細木商眾等公啓。
5.1911年(明治44年)2月25日2版	續記本島之製造品…木細工及家具。八九年來之利用本島材以製造雕刻物及家具者。各有勃興之勢。唯不見其有加意匠者。蓋因口資頗貴。故價格不廉，此亦當業者知覺注意也。…
6.1912年(明治45年、大正元年、中華民國元年)3月17日8版	本島木竹工藝品。本島木工業尚稱幼稚，未用機械力量，未設大工廠，只是運用簡單器具手工製作日常家具、器具，其製法粗糙沒設計意涵，有良好的名材卻沒好好利用。連運用像中國式的雕刻、鑲嵌等純熟技巧製作的典雅作品也不得見…。

從第一條報導搭配前段「臺灣紀要」文的後半段所述，古日人統治之初，台灣木工藝產業中家具工匠與產業其實原本並不具體古古，甚至連日人古古古也只有專屬「製具」的工廠與工匠古古，似乎此時期的家具工匠是混於木製業工匠的計算之中，仍未單獨另計。而也就像對證此論點般，於第二條顯示，再過9個多月後的同報記載中，就表明確有許多木製業工匠開始轉作家具師的報導出現。而至1908年(明治41年)後的第三條，以台北為例出現約四百多名內含台人、日人的各種木工匠，也可看到像台北般的大都會區木工藝產業的成長成果，甚至如第四條的敘述般，細木商(約等同於家具製造者)已出現如同工會型態般的組織，這紀錄本身應不會有問題，但奇怪的是這類記載幾乎僅見於此，木工藝產業組織的有關紀錄自此以後，則也幾乎要等約30年後的日治後期才古最後幾冊的「台灣總督府統計書」中，才又再出現兩年份的統計數字，而且從不曾古各類相關文獻中見過有關組織方面的報告，實極令人匪夷所思。最後的第五條與第六條，則表示至1911年(明治44年)



圖4 販賣西洋家具廣告

即將邁向日治中期之前古台灣，木工藝產業的稱謂終逐漸成型正式化，像是從1908年（明治41年）起的「木匠」，至1909年（明治42年）的「細木商」，再到1911年（明治44年）的「木細工」，以及1912年（明治45年、大正元年、中華民國元年）的「木竹工藝品」、「木工業」等用語的出現與生根，正好可以連接與解釋日治中期開始之時，便出現木工藝相關產業統計數字的原因來源。至於五、六條皆提及的不見良好設計與製造技術，似乎是一直散佈於日治時期50餘年間的一個未見解決的爭議議題，相關論述也會在日治中、後期的相關章節敘述中，進行專論解讀，在此也暫且擱置。

例是古本時期既然不尊崇本工所出產的本工製木工家具器物，那麼究竟日人又從日本本工引入些什麼樣式的木工家具器物。為解答此問題，本段便以「臺灣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中的相關插圖與敘述進行特徵描述，並作為本節的總結。古1896年（明治29年）的「臺灣新報」已經開始出現名古匠日人建設工廠古古打出日式、西方式的住宅建築與建具、家具器物製造的廣告，而同年12月22日的報紙也出現販賣西洋家具（圖4）的廣告[24]；1898年（明治31年）的「臺灣日日新報」也出現販賣各式西洋家具的敘述廣告（圖5）；至1900年（明治33年）年開始有家具實物插圖（圖6）；1906年（明治39年）時開始有桌子實物插圖（圖7）；1908年（明治41年）本節一開始所提及的「三共舎」工廠廣告（圖8，作為跟前文對照的參考用圖）；1910年（明治43年）廠商邀請西洋家具匠師來台促銷家具；1912年（明治45年、大正元年、中華民國元年）的東京箏箏（日式櫃）廣告（圖9）；以及1912年（明治45年、大正元年、中華民國元年）的日式建具廣告（圖10）[17]。從以上這些插圖與文字資料，可以得出五點心得。1. 日治前期之初便有日本廠商開始向台灣引入西洋家具，讓台灣民眾有機會開始接觸這些西洋風味的事物，擴展台人使用更多不同種類形式家具的習慣。2. 「家具」這字眼，至目前為止所得資料而言，1896年（明治29年）的「臺灣新報」上所登載的日本木工家具商的販賣廣告可能是古台灣最早出現的時間點。3. 1900年（明治33年）開始出現家具插圖的廣告，從中也可發現椅面設計已不再純粹是木板面，而有靠墊形式的椅子形式出現，而且日本明治時期便已引入日本的車枳（木工車枳）技術，所製造出的車削腿部構件也可從此時期的廣告中看見，並逐漸影響台灣木工藝產業技術的變化成長。4. 至於其他附圖如西方式桌、日式箏箏（日式櫃）、日式建具等廣告插圖的出現，則代表著西方式與日式風格的家具、建具產品正漸漸引入台灣，並開始影響台人的使用習慣。而產品使用習慣形成後，也會開始逐步影響本地製造技術的發展，不過有較正式影響的時期應該要等到進入日治中後期以後才會開始。5. 看的出來日人統治台灣後，馬上就快速引入古日本工影響一段時期的家具使用與製造觀念，或許一開始訴求的動力是放在古古台日人的身上，對台人的影響並不顯著，但無疑這也是一種加速台灣木工藝產業發展進程的方法。而這類概念的正式事實成形，則大概是至日治中期有中國人陸人正來台參訪，然後從其歸鄉後所發表記載其心得的旅行紀錄中便可探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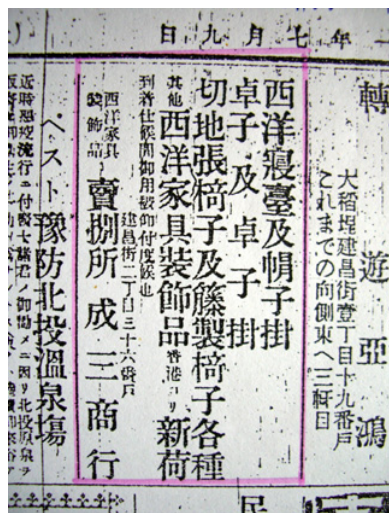


圖5 販賣西洋家具文字敘述廣告



圖6 車枳椅子家具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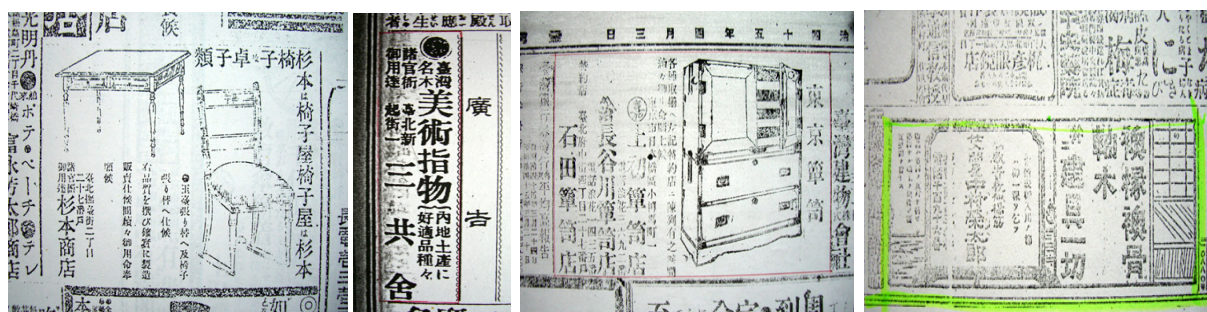


圖 7 桌子實物插圖

圖 8 三共會廣告

圖 9 東京箆筒(日式橫)廣告

圖 10 日式器具廣告

2-5 對外展覽會中所顯示出的台灣木工藝產品特徵

或許日人一開始並不滿意仍在開發中的台灣之部分相比日本本土較為落後的事物，所以對仍尚萌芽成長的台灣木工藝產品與相關製造技術無法產生太大好感。不過作為日本第一個可以象徵代表著跟歐戰帝國強權並肩而立的殖民地統治事蹟，台灣的所有事物仍皆可能是日本可以拿來跟西方人士誇耀的「特產」，木工藝產品自然也是其中的「特產品」代表之一，而且所展出的可能還是頂尖的產品。所以正好呼應上一節最後的部分談到日治前期木工藝產品從日本引入台灣的具體事蹟，本節所要談的剛好是相反方向，是從台灣所拿出來推廣的木工藝產品（雖然可能談論到的都是精英產物，但至少可以代表一部分台灣木工藝產業的發展實貌，而且還可以相互比較，因為一般平民百姓所用的一般器物，從文獻中根本很難看的到什麼重要記載）。而具體可以展示這些事蹟的最佳場合自然便是各種海內外舉辦的大小展覽會場所，尤其是自19世紀中期開始的「萬國博覽會」更是主要對外宣傳國威與推銷自我產品的最好目標。

在進入主題前，先談一段日人從19世紀開始參與海內外展覽會過程的發展簡史，以便跟後來日本統治台灣後的參展過程，進行發展過程上的銜接與因果關係上的理解。眾所皆知「萬國博覽會」通常是代表著「帝國的時代」，帝國主義勢力高漲的外顯重要象徵。這是各帝國列強除以船堅炮利征服與統治弱小國家，並給予自己人民國家強大的信心來源之外，另一種維繫其統治能力所展現的論述方法。歷史上首次的「萬國產業成就博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出現於1851年於大不列顛帝國首都倫敦，吸引當時諸多世人的目光。而不甘示弱地，1855年法國也於巴黎舉辦「巴黎農業、工業、藝術世界博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s produits de L'Agriculture, de L'Industries et des Beaux-Arts）」，且諸多國家皆在此場合中開始大量宣傳展出其殖民地，以充分展現出帝國的權勢，而這也持續延續到接下來的各種博覽會與展覽會展示安排之中。自此之後，至20世紀初為止（約略定於日治中期以前的1911年五月），陸續舉辦過如1862年第二次倫敦萬國博覽會、1867年巴黎第二次萬國博覽會、1873年維也納萬國博覽會、1876年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1889年巴黎世界博覽會、1893年美國芝加哥紀念哥倫布世界博覽會、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1901年泛美萬國博覽會、1904年路易斯安那領土購入紀念博覽會等視為重要知名的大型世界性博覽會。

日人自明治時期（1868年）以前仍屬鎖國政策時期，與西方列強的接觸並不太多，但仍是於1862年（幕府時期文久2年）派出使節團赴歐參展第二次倫敦萬國博覽會，展出東方日本的風土文化產物，這展出影響後來歐洲人對東方（尤其是日本）的認知與觀感，同時也促使日人開始認知博覽會所能帶來對國家、產業發展的利益價值。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首先就參加1873年的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之後除持續不斷積極參加海外的各式展覽會外，在其國內也陸續舉辦全國性與都市性範圍的大小展覽會，而全國性的「內國勸業博覽會」、「全國製產品博覽會」於1877、1881、1890、1895、1903、1909、1910、1912等年度皆曾舉辦過[10]，並成為明治後期日本社會全體的共有經驗。

至於台灣自進入日治時期後，自然也會受到相同影響，台灣最早應日本本土之邀參展為1897（明治30年）於長崎舉辦的「第九回九州沖繩八縣聯合米外十八品共進會」，送出農產品、紡織、染、竹製品、

刺繡、水產品等貨物到會場，由此可看出當時台灣的木工藝品確實還未能登上檯面。然後到 1900 年（明治 33 年）日本統治台灣後，首次將台灣送上國際展覽會舞台的便是參加巴黎萬國博覽會，這是第一個日本對外宣傳其擁有殖民地對外宣傳的大好機會，所以當時的台灣總督府也積極參與，成立「出品調查委員會」，並送出 53 項，1900 餘件的展出品。展出品中跟木工藝產業較為有關的是林產專業介紹項目，而經由 1898 年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技正鐸木宣之助調查後，提出林產出品標準[34]，最後選出 15 種包括樟木、肖楠、楠木、茄苳、欖木（沒有檜木）等台灣原產重要樹種，並詳附用途說明，如建築材、車材、家具器具用材等文字敘述（非實物展示）。不過此時期確實都未提及木製產品，只有提及原料，原料中也沒有檜木出現，整體觀之非常符合前面數節所提及日治之初的相關情景表現。

緊接著在日治前期台灣所參與的重要展覽會活動，大概就是 1903 年（明治 36 年）的「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圖 11）」。此展覽會中設有「臺灣館」，可說是日人於統治台灣後，在其本土內首次大規模於全國性展覽會中，展示出日本人的光榮新領土之舉。除建築物展示出中國式的風味特色（圖 12）外，也大篇幅加入關於原住文化的介紹，以及異國情調的特產品販賣。參展產品中，農產品仍佔大多數，不過工藝製品數量於本次展覽中也居第二位，其中跟木工藝產業有關的材料與產品展示內容，從配置圖中可知包括有木材竹材及工藝用原料、家宅用具、桌椅等類、宗教器具、神像、廳堂之設置等皆成爲展示主力（如圖 13、圖 14 所示）[1]。由圖 13、圖 14 可知，中國華南式高級木工藝產品被拿來當作一種台灣本土特色產品進行展示，這展示物當然代表著當時台灣木工藝品的最佳表現，而這雖主要只是對日人進行宣傳用的物品，但其實也同時透露出當時台灣能夠送出展示宣傳的高檔產品究竟是長成個什麼模樣的最好答案，也顯示出當時台灣木工藝業匠師所能製造的產品最高水平究竟到何種境界層次。



圖 11 大阪博覽會正門前廣場
資料來源：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摘自展示臺灣



圖 12 臺灣館正門入口前廣場
資料來源：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摘自展示臺灣



圖 13 臺灣館館慶堂內模擬漢人家庭廳堂陳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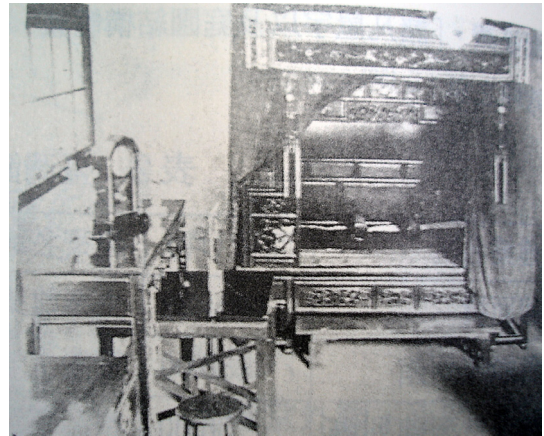


圖 14 臺灣館館慶堂內模擬漢人家庭寢室陳設

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後，日治前期到 1912 年為止，台灣又參與 1904 年（明治 37 年）的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1907 年（明治 40 年）的「東京勸業博覽會」、1910 年（明治 43 年）的「日英博覽會」等國內外大小展覽會活動。1904 年的聖路易萬國博覽會的日本館中，台灣也送四分之三比例以上的農產品，與木材竹材十餘件，以及桌 4 件、櫃 1 件、帽架 1 件等少量產品出展，算是台灣本土製木工藝產品邁向國際舞台的第一小步；而對於像東京勸業博覽會一般的國內展覽會，大概台灣木工製造的家具、器具等，皆已是固定的重點展出項目之一，這表示從約 1905 年以後，至進入日治中期前的約 7、8 年之間，台灣的木工藝產業雖還未出現具體統計數字，使能從數量上證明其發展樣貌；但仍可由上述推論中得知，此期間應該已經有所發展。並且，其發展的可能性軌跡將來在進入日治中期論述後，會進一步用正式的統計數字（從 1913 年大正 2 年後，便開始有地區與整體詳細記載的統計報告書出現）進行回溯探源工作，屆時便可以適度地與本時期的後段內容進行整合性串聯。

2-6 手工製作技術與機械化進程的發展以及傳承教育面上的影響

前面曾經多次提及日人對台人工匠的技術沒有太好評價之例，如 1903 年（明治 36 年）刊行的「臺風雜誌[9]」中所云：「…就而視其工具，種類甚少，而鈍脆不足用。其使用鋸鉋，向前方而推之，全與我工匠相反，宜其勞力多而成功少。獨怪我文具之遠來於清國者，大抵多精緻可觀者；而臺匠今如此，其所由來果何如？評曰：良匠先利其器。臺匠之拙劣，其或未得良器歟？」以及次 4 第 6 條所述，顯示出日人對台灣繼承中國大陸傳來技術，卻無法展現出所期盼看到的水準，是因為製作技術（尤其是所使用工具）甚為低劣，且沒有機械力量，沒有大車房工廠之故。但拋開這類可能問題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判別說法，在此不需過度揣測外，台灣當時的木工藝相關技術發展實貌又是如何？本節首先便從此處進行切入。

在談及日人對台灣的技術評價之前，必然要先回顧在此之前日本本土的相關技術發展已經到達什麼階段。從日本著名木工藝研究學者成田嘉一郎於其著作「木工機械の沿革[7]」書後附錄所附日本木工機械發展一覽表中，可以摘出幾個重要事件的發生時間點，如 1850 年自荷蘭購入長鋸、圓鋸等工具；1858 年自英購入木工車床；1868 年日本海軍成立製材廠與木工廠；1888 年生產第一部日本國產試作製材機；1989 年自製木工車床（圖 15）；1897 年（明治 30 年）第一部日本國產營業用製材機生產；1904 年（明治 37 年）生產木工用機械；1910 年（明治 43 年）設置熱風木材人工乾燥設備等等。由此可知日人在統治台灣之前，便已有從海外購入木工器械使用，甚至以此組建工廠的事例，而從 1888 年以後，日本已經能自行試行生產各種木工機械，雖然其正式生產營業用的機械要延至統治台灣後的 1897 年以後，但其實此論已經確實表示出日人在統治台灣之始，便已經具備有機械化木工藝產品的生產製作技術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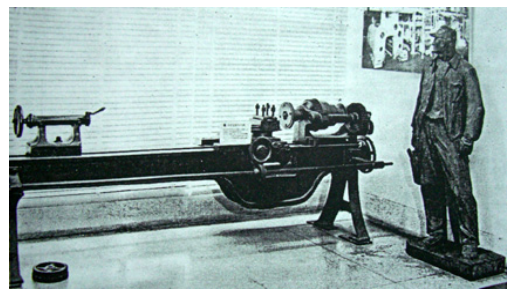


圖 15 日本自製的木工車床
資料來源：日本科學技術史大系第 18 卷機械技術
日本科學史學會，1966

以上述為基礎，再回過來看台灣。日治前期台灣仍處於純手工製作技術的操作時期（圖 16），在日人的眼中，這自然便容易產生較低評價。而日人在統治台灣後，那些前述已經影響日本本土一段時間的木工機械工具，又如何開始引入與影響台灣？這或許可從「臺灣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紙廣告中稍稍作探究。

首先，1897 年（明治 30 年）2 月 2 日的「臺灣新報[25]」中，出現徵募「旋盤師（車床師）」（圖 17）」的人事廣告，而緊接著次年的 1898 年（明治 31 年），從「臺灣工場名簿[30]」中也可得知台灣創立最早的木工車床工廠「森茂木工所」於台北設立，這是相關木工技術製造業設立工廠的開始。此外，各種

木工機械也開始透過報紙廣告一步步引入台灣，並逐漸改變台人對機械力量使用的認知。如1906年（明治39年）日本商社介紹販賣木工機械的廣告（文字敘述，圖18）；1908年（明治41年）時的刨木機實圖廣告（圖19）、車床實圖廣告（圖20）等[21]，皆可視為日人亟欲打開台灣機械使用市場，而積極向台灣宣傳廣告之意向。不過木工機械於此時期大多只是停留於紙上的廣告宣傳程度，而其對木工塾產業中匠式的開始參與，則要到日治中後期以後才會逐漸出現。



圖16 日人眼中的台灣製材與木工相關技術操作的實景插圖

資料來源：地理風俗臺灣事情，1895；

台灣日日新報 1898.8.21、1898.11.23、1898.11.27

圖18 販賣木工機械廣告

圖17 徵募旋盤師廣告

圖19 刨木機實圖廣告

技術的學習與成長是依靠教育傳承來進行其延續的過程。在瞭解上述技術變化的特徵後，最後本段則從傳承技術的教育面向上進行重點論述，以求從技術發展到教育傳承整體探討的完整性。主要討論議

題乃從日本既有的傳統技藝傳承法則與外來現代化的教育文化模式中，確認兩者所影響傳承技術上的相異性。

工匠從中國大陸來台之時，通常帶來的是原鄉流傳已久的既定傳承模式，而最為人知的說法便像是「南部臺灣說[14]」中所述：「…其長於工藝（應該是指技術）者多為福州、興化、漳州、泉州人。工藝傳授一期三年四個月，學徒接受學習時先向師父拜帖，然後從其師父學習。食、住由師父供給，年內也給與衣服、鞋資等若干零用錢，期限滿後可出師離開。倘若工藝未精，可再補習一年。離開師父表示學藝已成，倘若期限未滿半途而廢者，須放棄原學技藝，另學他業。假使學業未成，就以未成的技藝進行執業工作，乃是背師之名，當送官究辦責其不是，並向其師父賠罪…」之說法，這也是中國文化中承下來的技術傳承（學藝）規則，也是所有工匠對熟能詳的說法。這情形除如本頁獻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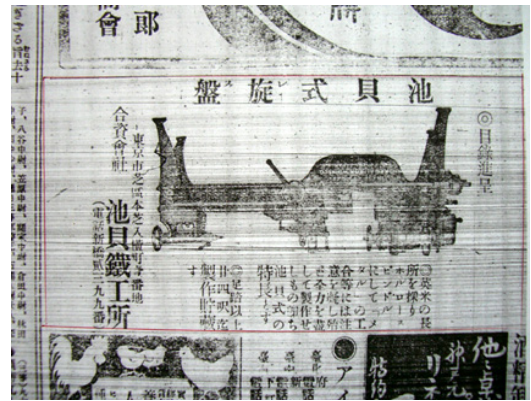


圖 20 車床實圖廣告（圖被 180 度反貼）

宮般清楚說明外，至 1909 年（明治 42 年）3 月 28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中，更有細本商人古報紙上清楚公佈管制規約（詳見表 4 第四條）的宣示出現，代表著本時期其實已經開始出現傳承上的逐漸崩壞情形（不然就不會有人古報上三令五申、大聲疾呼），以及為維護既有規則（或許也含有利益成分），而讓眾細本商人聯手出擊，以求反制破壞規則的其他不合群的工匠師傅們。

雖說如此，但隨著日人開始統治後，所逐漸帶入開放且新穎的西方思潮影響下，教育方式的思考模式逐漸改變，其實多少也會影響既有的傳承體制維繫更形艱難。本時期日人開始逐漸導入新的學校教育模式，雖說影響層面一開始並不太大，但隨其逐年成長，遲早也必然會衝擊既有的傳承體制，並為本工藝產業的發展帶來變化影響。本時期較為具體的演進流程約略敘述如後。1900 年（明治 33 年）初，台灣總督府為培養將來的工業人才，特在國語學校內設置工藝部（內含電信、鐵路兩學科），時論將此事視為台灣工業教育之曙光；1909 年（明治 42 年）當國語學校實業部不再招生，農業試驗場變成唯一職業教育施行的場所，古「本島人與實業教育[5]」一文中便提及：「本島人唯一的職業學校可說是農業試驗場，該場的本島人講習升分為獸醫科、林業科、農科等三科，…然而，其目的僅限於培養農民人才，…吾人不得不希望設立手工學校，以作為培養多本島青年之收容所，或本島所缺的工業助手之養成所」，也明確表示出台灣本島發展工業職業教育對本島產業振興的重要性；此外，1907 年（明治 40 年）的「臺灣日日新報」也報導：「教育者常須與土地之狀況不離也。…自一年至四年級之遊戲時間。現彼等在自宅所弄為何物。而備置木匠用之道具或土匠及細工匠之用具等與之。自然足以助父兄之家業及其他之關係。更至五年級以上。於手工科為將來彼等之一助。且公學校教育。於彼等此後生活之問題大有關係。…[23]」，由此也可感受到欲透過學校教育以促進家庭事業、個人職業學習成長的目的，而這也是學校教育成為未來技術傳承新方法的思考模式之一例證；最後，受到各界熱烈需求的呼應，總督府於 1909 年正式開始規劃設置工業學校，但最後因為產業及人力實際上的需求，反而設計成工業講習所形式，1912 年（明治 45 年、大正元年、中華民國元年）7 月公布民政部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規程，教科分為木工科、金工及電工科兩分科[28]，工業講習所的出現開啓出本國教育正式進入職業教育傳承一環的開始，也帶出另一種傳承可能新方法的思考影響。工業講習所畢竟仍是正式的組織機關，但之後比照類似於工藝講習、技藝講習，以進行技術傳承的新式實施操作模式，卻在台灣各地逐漸延燒，並成為匠師、廠商間交流傳承的重要參與活動，這是進入日治中後期以後的事，古此先預為提示。

三、代結語——一個終點與起點的重疊位置

接下來的這個第三章「代結論」是作為本論文的結論位置部份而存在，但是做為研究系列整體的一部份，尤其是日治時期系列中的第一篇，在此提出終結式的敘述似乎有些過早，且也不太適合。頂多只能說是作為本時期（日治前期）論述結束時的一個暫時性結論，以及站在此與接續第二件之間的一個承繼性橋樑的角色扮演。議題的深入探討與延續發展的引發其實在前面各節的論述中均已有所提及，故此處只再作更綜合式的議題彙整與重要延伸議題提示。

3-1 從清治時期進入日治前期之後的轉變特徵

清治時期台灣的日常生活一直依賴著中國大陸的原鄉供應，輸入的家具、木製品是移民信賴使用的的生活器物；依靠外地輸入的情形對仍在開發中狀態的台灣而言，進入日治前期後也沒有太大變化，只不過原本大量仰賴中國大陸的供應關係，逐漸轉變成開始增強仰賴從日本進口的供應關係，日本逐漸變成提供台灣家具、木製品的最大來源。至於現地材料的運用在清治時期主要因為基於樟腦的採取，而對材料只僅於使用用途上的開發瞭解，真正使用材料仍仰賴中國大陸（福州杉木）；此情形在進入日治前期後，也逐漸開始轉變成開始仰賴日本（杉、松、檜等）木料供應。

至於木工藝產業的發展方面，清治時期，尤其至進入後期（約19世紀以後），隨著移民的逐漸增加，經濟逐漸繁榮之故，從中國大陸也開始有木工藝產業相關工匠移民來台，甚至落地生根於此，並以工匠名號為中心（偶而也會出現小型店舖名號）展開發展；這在進入日治前期後，個人式工匠的經營形式也隨著需求與從業人口增加而開始有所轉變，小人數工匠的經營形式於台灣各地開始逐漸成長。至於木工藝產品形式在清治時期當然仍以中國華南地區為大宗；而這也隨著日人統治之後，日人所帶來的西方式、日式木工藝產品逐漸增加的情況影響，生活中器物使用的習慣也開始有所轉變，如日常生活中加入西方式、日式木工藝產品的使用逐漸也習以為常。

至於代表著臺灣從中國大陸傳習而來的原鄉高級木工藝技術，在清治時期因為同中國製品沒什麼差異，加上發展時間仍短，自然地台灣的中國式製品也不可能會受到太多特別注意；不過此情形在進入日治前期後，因為不同的異國統治省之故反而開始有所轉機，中國式製品成為日人對海內外人士宣傳殖民地風情的最佳對象之一，所以便可以在當時各種海內外大小展覽會中充分領略其目的展現。至於清治時期的中國傳統木工藝技術（純手工製作的技術），在進入日治前期後仍未受到太大影響變化；只是本時期日人逐步向台灣引入新式木工藝機械，算是木工藝產品製作技術開始邁向機械化進程的第一步宣傳。而這些製作技術上的轉變，更加促使原本於此時期便已存在的傳統傳承制度之崩解，再加上日人所引入的西方近代教育制度與思想的影響，雖說演變過程是條漫長路途，但傳統的傳承制度仍是不得不開始面對要逐漸離開舞台的準備動作。

3-2 日治前期（明治時期）的發展特徵

日人初統治台灣之際，首重平撫居民，加強統治基礎。再來為能更為順利進行統治，便展開各種大規模調查。在統治初期（19世紀末）可以看的出來大部分仍維持清治時期的既有模樣較多，有實質變化的大概便屬輸入管道的轉變較為明顯，而換異國統治後，新的異國產、社、經各式因素引入應該才是本時期最大的變化影響來源。如前節所述的材料使用、產品形式轉變、製造技術的變化都從本時期開始受到日人所帶來的日化、西化影響而逐漸改變。雖然這些變化的程度並不那麼明顯直接，但將其比喻成成形前的「醞釀與成長時期」卻恰如其分，相當貼切。而從工匠個人逐漸匯集成工廠、店舖型態的經營方式，雖然也可能多少會受到日人入台經營的影響所致，但綜觀全期發展，則仍較像是台灣木島產業型態在自然成長的發展下必然會產生的結果。

3-3 在進入日治中期（大正時期）後可以持續加以觀察的變化特徵

本節所述內容雖說與本論文並無直接關係，但仍可承接前兩節所述的基礎上，以此段提示內容先行預視本系列研究持續發展的未來走向。像是那些項目是進入日治中期後可以繼續觀察的重點？最重要的或許當屬材料使用習慣上的逐漸轉變，本地產材，尤其是檜木（扁柏、紅檜）林場的日式啓用與開採，逐漸開始影響台人用材的習慣；至於台灣本島木工塾產業的成熟化，也開始逐步從相關日式產業統計數字的反應變化上，以及從相關工廠漸形詳細的公開資訊中現其端倪，而日式、西方式產品逐漸進入台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景也開始可從照片文獻中一窺其貌；此外，台灣本島地方木工塾產業相關的促銷展示、宣傳廣告、交流講習活動也逐漸發展增強，其並成爲支撐台灣木工塾產業更爲擴張壮大的構築基盤，也是值得關注的一個重點項目。

註釋

- 註 1. 日人日式古台灣進行林野調查始於 1911 年（明治 44 年），台灣第一座開發林場阿里山林場的日式開始採伐，則於其次年 1912 年（明治 45 年、大正元年、中華民國元年）展開。
- 註 2. 日治時期跟木工塾產業有關的工廠名稱出現，實質上是至 1918 年（大正七年）以後所刊行的「臺灣工場通覽」中始見記載，這之前的工廠名號記錄當然仍可從「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等相關報告中查尋得出，但綜觀之幾乎全是農林產加工業、工具鐵工業等項目的工廠名號，而沒有類似木工塾產業工廠的相關記載存在。此情形要等到進日治中期後（1912 年以後）始有製材廠記錄，然後至 1918 年所刊行的「臺灣工場通覽」中有家具工廠等相關工廠名號記載出現，才開始有所變化。這或可也可說成是台灣木工塾產業日式形成氣候，加入產業項目一環的開始。
- 註 3. 「臺灣新報」是「臺灣日日新報」的前身。「臺灣日日新報」於西元 1898 年由日人守屋善兵衛併購「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而成。「臺灣日日新報」首創刊之初有六個版面，1901 年 11 月以後增爲八版，其中漢文版通常佔有兩個版面。自西元 1905 年 7 月 1 日以後，報社將漢文版擴充，獨立發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每日六個版面。西元 1911 年 11 月 30 日，恢復成日文版中增加兩頁漢文版面的作法，直至西元 1937 年 4 月 1 日起全面廢除。

參考文獻

1. 月出皓編，1903，〈臺灣館〉，p.44，第三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協贊會。
2. 大野馨，1895，〈地理風俗臺灣事情〉，插圖頁無頁碼，山川閣。
3. 石弘毅，1999，“台灣「神像」雕刻的歷史意義”，〈歷史月刊〉第八十期，pp.41-42，歷史月刊雜誌社。
4. 阪田作，1899，〈臺灣踏查實記〉，pp.172-175，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5. 田原禎次郎，1909，“本島人と實業教育”，〈臺灣教育會雜誌〉第88號，p.4，臺灣教育會。
6. 竹原あき子、森山明子，2003，〈日本デザイン史〉，p.22、48，美術出版社。
7. 成田寿一郎，1976，〈木口機械の沿革〉，附表無頁碼，日本木口機械新聞社。
8. 村上玉吉，1899，〈臺灣紀要〉，p.180、183，警眼社。
9. 佐倉孫三，1903，〈臺風雜記〉，pp.26-27、47、53，東京國光社。
10. 呂紹理，2005，〈展示臺灣〉pp.94-95、116、123，麥田出版社。
11. 青木恒三郎，1896，〈臺灣鳴〉，p.98，青木崑山堂。
12. 林百川、林學源，1898，〈樹杞林誌〉，p.107，臺灣省公獻委員會。
13. 松島剛，1897，〈臺灣事情〉，p.17，株式會社秀次吉第一工場。
14. 花崗伊之伴，1902，“第七篇產業”，〈南部臺灣誌〉，pp.36-38，臺南廳編纂。
15. 參謀本部，1895，〈臺灣誌〉，pp.104-105，八尾書店。
16. 無作者，1908，〈島內消費木材調査〉，p.12、28、29、31、61。
17. 臺灣日日新報，1898，“成三商行”，〈臺灣日日新報〉第55號(1898.7.9)4版；“伊勢商店”，〈臺灣日日新報〉第712號(1900.9.13)6版；“杉本商店”，〈臺灣日日新報〉第2404號(1906.5.9)6版；“三共吉”，〈臺灣日日新報〉第2966號(1908.3.24)4版；“橫山支店”，〈臺灣日日新報〉第3519號(1910.1.22)；“石田節翁店”，〈臺灣日日新報〉第4254號(1912.4.3)8版；“日入問屋中村榮太郎”，〈臺灣日日新報〉第4293號(1912.5.13)6版，臺灣日日新報社。
18. 臺灣日日新報，1899，“營業品目”，〈臺灣日日新報〉第413號(1899.9.15)5版，臺灣日日新報社。
19. 臺灣日日新報，1900，“竹橋狀決”，〈臺灣日日新報〉第596號(1900.4.29)6版，臺灣日日新報社。
20. 臺灣日日新報，1901，“五月中本島內地間輸出入貿易”，〈臺灣日日新報〉第938號(1901.6.20)2版，臺灣日日新報社。
21. 臺灣日日新報，1906，“イエチ、ハンター占名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第2458號(1906.7.11)4版；“平削盤”，〈臺灣日日新報〉第3063號(1908.7.16)6版；“池貝式旋盤”，〈臺灣日日新報〉第3064號(1908.7.17)6版，臺灣日日新報社。
22. 臺灣日日新報，1907，“嚮天山檜材”，〈臺灣日日新報〉第2638號(1907.2.20)6版；“本導首檜與內地檜”，〈臺灣日日新報〉第2675號(1907.4.6)4版，臺灣日日新報社。
23. 臺灣日日新報，1907，“將來之計畫”，〈臺灣日日新報〉第2866號(1907.11.20)34版，臺灣日日新報社。
24. 臺灣新報，1896，“君餘請負業擴張廣告”，〈臺灣新報〉第83號(1896.12.11)4版；與“日中商店”，〈臺灣新報〉第92號(1896.12.22)4版，臺灣新報社。
25. 臺灣新報，1897，“職工募集”，〈臺灣新報〉第120號(1897.2.2)4版，臺灣新報社。
2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897-1901，〈嘉義管内採訪冊〉，p.10、41，臺灣銀行。

27.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之書課、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之書課、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1896-1911，〈臺灣總督府第一統計書〉至〈臺灣總督府第十六統計書〉，臺北活版社、小林活版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28.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1914，〈臺灣總督府第十六統計書〉（1912—大正元年版），p.105，臺灣日日新報社。
29.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0，〈臺灣工場通覽〉（1918—大正7年版），pp.154-162，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30.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32，〈臺灣工場名簿〉（1930—昭和5年版），p.97，印刷印刷工場。
31. 臺灣舊慣調查會，1905，〈臨時舊慣調查第二部經濟資料調查〉，p.495，臺灣舊慣調查會。
32. 蔡振豐，1897，〈苑其志〉，p.92，臺灣省之獻委員會。
33.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05，〈臨時舊慣調查第二部農工經濟之部〉，pp.523-564、577-590，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34. 鐸木宣之助，1898.5.11，“佛國大博覽會出品物蒐集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330冊12號12門：殖產：博覽會永久追加，光碟編號00330，臺灣總督府。
35. 權藤武，1903，〈臺灣實況〉，p.113，東京法學社。

誌謝

本論文乃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感謝國科會對本研究計畫之經費補助，謹此致謝。計畫編號（NSC92-2411-H-324-005、NSC93-2411-H-324-001、NSC94-2411-H-324-002、NSC95-2411-H-324-003）。

A Decipher to Wooden Craft Industry's Ger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aiwan (2) —The "Industry's" Brewing and Growth in the Prophase of Japan Dominion Period (1895-1912)

Chuko Che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sign,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mail:cchuko@cyut.edu.tw

(Date Received : September 13, 2006 ; Date Accepted : December 02, 2006)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the first paper of Taiwan's wooden craft industry history research series in Japan dominion period. The research mainly consists in constructing the whole annotation structure of Taiwan's wooden craft industry history in the prophase of Japan dominion period, and gradually analyzes all sorts of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 process. Research's range gathered in prophase that Taiwan had just governed by Japan (From 1895 to 1912 year).Th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four points: 1. Know the dependence of importing materials and utensils gradually turns from China to Japan, after Taiwan entering the period of Japan dominion prophase from the Qing dominion period. 2. Receive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governance, Taiwan's original product constr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starts changing into Japan style and westernize style. 3. Past individual mode of operation gradually goes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factor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4. New education methods led into Taiwan start to influence the original inherit mode.

Keywords: Wooden Craft Industry, Craft History, Design History, Taiwan

